

西夏研究丛书·第四辑 陈育宁 主编

西夏活字印刷研究

牛达生 著

XIAXUOZIXINYANJIU

宁夏人民出版社

西夏研究丛书·第四辑 陈育宁 主编

西夏活字印刷研究

牛达生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活字印刷研究/牛达生著 .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西夏研究丛书·第4辑)

ISBN 7-227-02873-9

I. 西… II. 牛… III. 活字 - 印刷 - 研究 - 中国
- 西夏(1038~1227) IV. TS81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0292 号

西夏活字印刷研究

牛达生 著

责任编辑 王永亮 何志明 马红艳

封面设计 姚洪亮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书 号 ISBN 7-227-02873-9/K·327

定 价 156.00 元(全六册)

西夏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编

史金波 陈育宁
杜建录 陈炳应

李范文 聂鸿音
韩小忙

白 滨
王天顺

西夏研究丛书·第四辑

陈育宁 主编

二十世纪西夏学

西夏出版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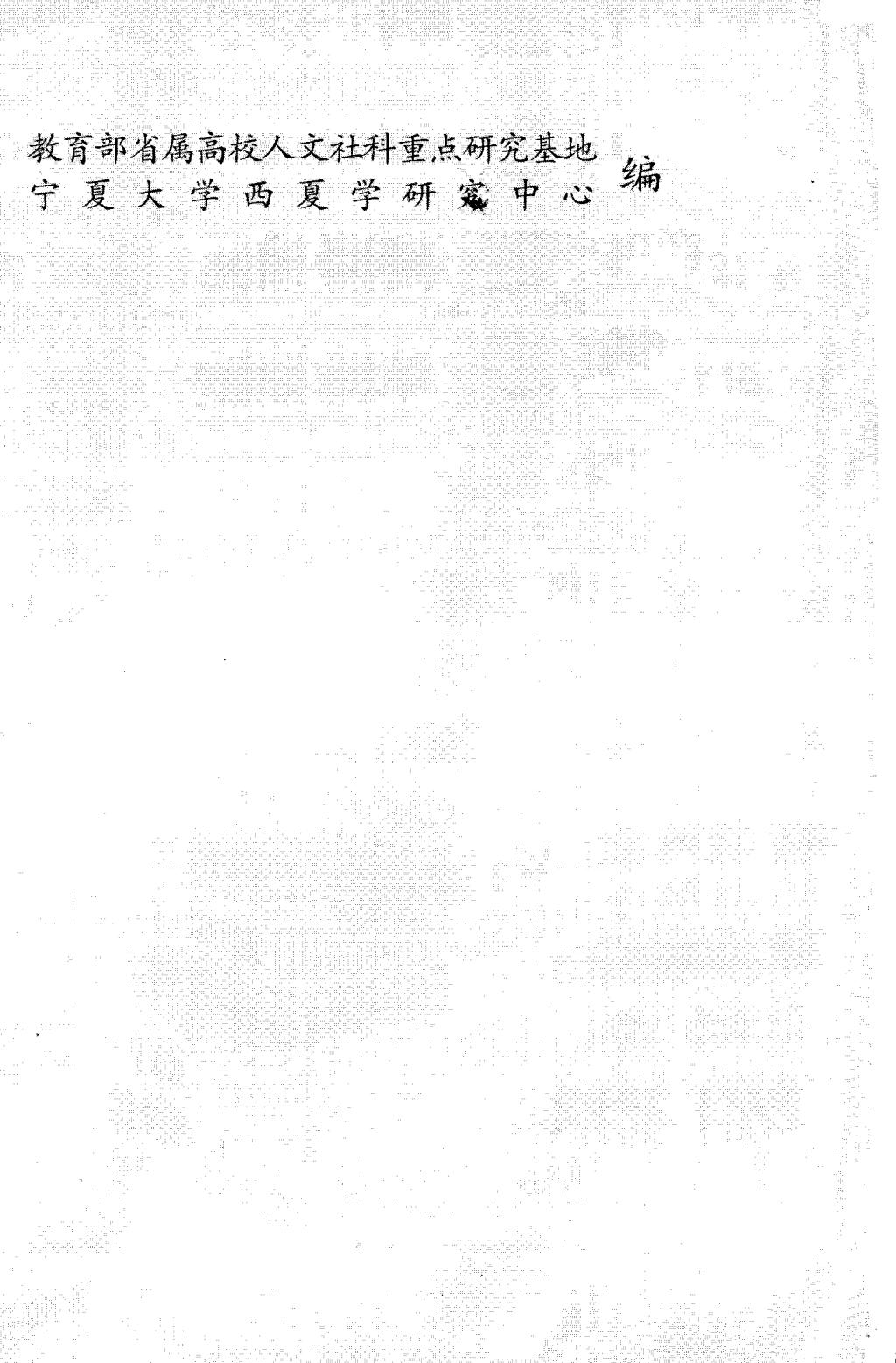
西夏活字印刷研究

西夏语音研究

宋史夏国传集注

宋西事案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 编



印刷史研究上的重大突破

——序牛达生《西夏活字印刷研究》

徐 庄

1990年，宁夏贺兰山中的西夏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毁。1991年，宁夏考古研究所和贺兰县文化局对这一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方塔位于贺兰山腹地拜寺沟中，距沟口有10公里山路，无车可通。这一项目的负责人牛达生先生虽已年近六旬，仍然跋涉崎岖山路，风餐露宿数十天，终于获得重大发现。遗址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献、文物，特别是其中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以下简称《本续》），经牛达生考证研究，认定为西夏后期12世纪八九十年代（约当南宋淳熙、绍熙年间）的木活字印本，这是国内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这应是印刷史研究上的重大发现和突破。

学术界对宋代毕昇创制活字早有定论，为什么说西夏木活字印本的发现是个重大突破呢？

这是因为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毕昇在宋代庆历年间（1041～1048年）试制木活字未成，而改试泥活字获得成功。印刷史学界把创制木活字印刷的时间，认定为元代大德二年（1298年）王祯用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之时。还因为我国在宋代首创活字印刷，只有文献记载，而未见宋元时期的实物留存下来，在西夏文活字印本发现之前，所能见到的只有明清时期的实物。因而有些国外学者甚至怀疑宋代有没有成功地运用活字印刷。牛达生先生对西夏木活字印本的发现与论证，证明了宋代首创活字印刷比德国的谷登堡要早400年的这一事实是不容怀疑的；并把我国创

制木活字印刷的时间，从元代提到宋代，整整提前了一个多世纪。

也有人说西夏文活字印本实物早就被发现了，为什么说西夏木活字印本《本续》的出土和确认是个重大突破呢？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西夏活字印本的发现和研究历程。西夏文的活字印本确实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被发现了，由此开始到 80 年代，中外学者多次对此认定并研究，取得了进展。其中特别是西夏学者罗福苌在 30 年代首次确认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为活字印本；其后中外学者又深入论述了《大方广佛华严经》木活字印刷的特点，并确认其为元初印制的木活字本，其年代应在元代王祯创木活字以前。在西夏时期的活字印本没有发现以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本实物。但因元代创木活字早有定论，所以同为元代的西夏文木活字印本实物的发现，没有引起印刷史学界太多的重视。

更为重要的是与宋同时代的西夏时期活字印本的发现。我们现在才知道，西夏时期的泥、木活字印本，早在 1909 年沙皇俄国的科兹洛夫在内蒙古西夏黑水城故址发掘时就出土了，它们静静地躺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文献柜中。俄罗斯学者虽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因西夏文字难解和对中国印刷史的不熟悉，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发现这些文献中的活字印本。而我国学者却因种种原因，无法看到这些文献，也就不可能去发现并研究了。到了 80 年代，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西夏学者克恰诺夫，在西夏文《三代相照言文集》的题记中发现有“活字”记载，并首先提出西夏时期有活字印本；90 年代初中国学者史金波、白滨、聂鸿音等在俄罗斯翻阅并拍摄西夏文献时，也发现了多种西夏时期的活字印本，但尚未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且因这些文献流失在国外，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1991 年，牛达生先生在发现西夏文佛经《本续》有可能为西夏时期的活字印本时十分惊喜，他敏锐地看到了其重要价值。他没有仅仅满足于公布一下考古结果，而是深入到他并不熟悉的印刷

史、科技史、版本学等领域，通过两年的悉心研究，在1993年12月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论文，并刊登在1994年2期的《中国印刷》杂志上。文中以充分的论据证实了《本续》为西夏后期的木活字印本，并阐发了这一发现的重大价值。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例如：在印刷史的研究中不少学者都认为，分辨一个版本为雕版还是活字，较为容易，而要区别泥活字还是木活字则较困难。而牛达生先生通过深入研究，提出木活字印本《本续》的十多个特点，其中有些是前人所没有提及的，如有隔行竹片印痕这一特点，它是早期木活字印本因技术还不成熟所造成的，它又是泥活字绝对没有的，因而又可以以此作为区别泥活字、木活字的一个重要依据。牛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印刷史学界引起极大反响，著名学者史树青先生评介道，牛氏总结出《本续》活字印本的十几个特点，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方面研究结合的很生动的一个学术研究例子”。《中国印刷》在发表牛先生论文的同时撰文指出：《本续》为西夏时期的木活字印本，这一研究成果如能得到确认，则意味着发现了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印本实物，也意味着宋代就有了木活字。不少印刷史专家改变了过去对古代少数民族印刷的研究不够了解、不够重视，甚至有些怀疑的状况，给予这一发现和研究成果以高度的评价。而1996年文化部科技司组织考古学、西夏学、印刷史、科技史、版本学等有关学科的专家对《本续》进行鉴定，最后形成的鉴定意见中称之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它对研究中国印刷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其后国家档案局又将《本续》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在牛先生研究成果发表稍后，1994年3月孙寿岭先生在《中国文物报》著文，论证1987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为西夏时期的泥活字印本，这应为世界上现存最早

的泥活字印本实物。史金波先生因其精通西夏文字，又数次深入考察了现藏俄罗斯的大批西夏文献，因而能从西夏文佛经的题款、发愿文的内容，当然也从印刷史、版本学的角度等多个方面、全面研究了西夏时期的活字印刷。确认包括敦煌文献在内的现存西夏时期比较完整的泥、木活字印本实物有8种，此外还有数百片不能确定名称的活字印本残片；且发现有资料可以证明在西夏后期已出现了管理活字印刷的官员。这些研究成果说明了：西夏时期活字印刷已不是孤例，而是已经形成规模；西夏泥、木活字印本，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批活字印本实物；西夏这一少数民族政权对古代印刷术的贡献应大书一笔；中国以至世界古代印刷史的某些内容，因此而要改写；这些观点现在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这确实是印刷史研究上的一次很大突破。而牛达生先生的发现和研究在这一突破中起了重要作用。1997年，牛先生因此获得了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印刷行业最高奖项“毕昇奖”，也是迄今为止所有受奖者中仅有的考古学者。1999年这一研究成果又获文化部文化艺术科技成果二等奖。

当然，西夏的活字印刷还有其整个印刷事业，都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例如：西夏时期活字印刷年代的进一步考证，活字印刷技术从中原传入及使用的时间，活字印刷技术从早期到成熟的发展历程，西夏在中国印刷术西传中的作用，西夏文献版本、印刷的研究和考证，西夏藏密风格版画创始及对元代木刻版画的影响，西夏书籍事业的价值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等等。相信随着西夏文献的刊布与研究，学术界对西夏印刷史以至文化史的重视与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必将会更大的进展。

当然这本集子的内容，不仅是反映了牛先生在西夏活字印刷上的研究成果；在对西夏书籍的装帧和纸张的研究，对西夏佛印价值的探讨，对北宋《观经》残页是佛祖版画的考证，对中国在宋末元初就出现了金属活字应为世界之首的论证，对我国唐初刊印、韩国出土的佛经《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刊印时间的考证等，也都有不

少独到见解。所以如此，这与牛先生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和踏
实求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是分不开的。

牛达生先生要我为他这本集子作序，实不敢当；写了以上这些
话，就算是一些学习心得吧。

（徐庄 印刷史学家，原宁夏人民出版社总编、编审，是
文化部聘请的《本续》为木活字印本的鉴定委员之一。）

自序

印刷术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我国古代印刷，主要是指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雕版印刷是隋末唐初出现的；活字印刷是北宋毕昇发明的。毕昇被称为世界活字的鼻祖，他的泥活字比西方的铅合金活字早了 400 年。除泥活字外，还有木活字、金属活字等。木活字传统的说法是元代王桢发明的。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是我国人民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汉文典籍中，唐、五代印本十分少见，多为考古发现。宋代是印刷术发展和繁荣的时期，但极为珍贵的“宋版书”，存世的也仅有千部左右，且多为南宋版本。需要指出的是，至今未发现宋元时期的汉文活字印本。西夏与宋朝相始终，从宋朝学会了印刷技术，并得到很大的发展。西夏普遍使用雕版印刷，同时还使用当时最先进的活字印刷。西夏书籍的价值，绝不低于“宋版书”。现存海内外的西夏印本有五六百种之多，但由于文字的阻隔，它的价值远未为国人所认识。这为我们进行这一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主持了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废墟的清理发掘，出土了一批包括西夏文献在内的西夏文物。其中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简称《本续》），经我研究，竟是现存世界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我惊喜地发现，这一成果，将木活字发明和使用的时间，从传统元代的说法提早到宋代，提早了一个多世纪。1993 年，这一成果发表后，受到社会和学界的重视，并在 1996 年经文化部组织专家鉴定确认。为此，笔者先后获得新闻出版署、文化部两项部级奖。

隔行如隔山。有人问，你这个搞考古的，怎么搞上印刷史了？

我说这是逼出来的。拜寺沟西夏文献的出土,给我出了难题,也提供了机会。《本续》刚刚出土,就令人兴奋:这是整本整本的,又是西夏文的,又是印刷的,在考古中是太难碰到了,有人说我这是“抱了个金娃娃”。但是,在日后的整理研究中,可就没有这么轻松了:书名是什么,是世俗文献还是佛经?是西夏印本还是元代印本?在西夏文文献中是多见本还是罕见本?当然还有是雕版印本还是活字印本;进一步,是木活字还是泥活字?等等,不一而足,问题一大堆。说实话,要解决哪一个,也不容易。好不容易把书名翻译出来了,知道它不是世俗文献,也不是从汉文佛经翻译的,而是从藏文译成西夏文的藏传佛教密宗经典,这着实让人轻松高兴了一阵。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由于那时有关藏学的出版物甚少,光搞清“本续”这个概念,就费了好大力气。又想到既译自藏文,是否还有现存的藏文原经呢?

自己是搞考古的。上面提出的问题,除考古学、西夏学外,还涉及佛学、藏学、版本学、印刷史、文献学等诸多学科。这些问题,远远超出考古的范围,更超出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说实话,按考古常规,发一个清理简报也算交差了,谁能说我没有完成任务呢!但是,我深深的意识到,考古学的任务,不仅仅是把田野工作做好,把出土文物梳理清楚,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多地发掘出文物中蕴涵的信息,充分展示它的价值,以便阐明更多的历史问题。如果能把上述问题搞出个眉目来,那才算是真正的完成了任务。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空间;有关领导的理解与支持,也为我提供了在学术领域自由驰骋的良好条件,笔者没有理由不搞好这些研究。应该说,皇天不负苦心人,所有先前提出的问题,以及后来产生的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并体现在本书有关《本续》的那几篇文章上。

我的研究工作引导我进入了一个非常陌生的领域。上了印刷史这条船,便不得不对研究动态和热点问题给以密切关注。这里

有宏观的问题，如对西夏刻书印刷事业的概述，对西夏活字印刷的总论，还有对古代印刷术的含义的重新认识等问题。更多的是微观的问题，如武威出土的西夏文《维经》，是否是泥活字？国家文物局曾经组织鉴定，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温州发现的《观经》残页，是雕版还是活字印刷，争论了近20年，两派相持不下；金代皇统千佛铜牌，说它是金代活字印板的论据是否充分？还有，韩国有的学者称所谓《直指》一书，是世界上最早的铜活字印本，是否持之有理？特别是韩国庆州发现的《无垢经》，是新罗印本还是唐朝印本，等等，都是近20年来学术界、特别是印刷史界最为关心、著文讨论最多的问题，也是我不时思考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下，就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不时冒出点点火花。当然，火花是会很快熄灭的，这就必须添加柴火，才能燃烧起来，烧成一个东西。我的这些文章，就是这样被“烧”出来的。

还需要谈到，一个观点的产生，一篇文章的形成，资料的收集和积累是至关重要的，往往因一条资料的难寻，一篇文章的产出，从构思、写出、修改、补充、反反复复，少则数月，有的甚至长达一二年。特别是拙文中的一些观点，与印刷史界权威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这就要求我更要严谨、慎重，不敢稍有疏忽。

这本小册子，是近10年来自己在版本、印刷史领域所做工作的汇集。所以称为“西夏活字”，并不是说都是西夏的，都是活字。从目录中可以看出，它包含的内容较为宽泛。既有活字，也有雕版，还有与印刷有关的书籍装帧、纸张等；既有西夏，还有宋、金甚至韩国的，有点五花八门了。但这些都是从我研究《本续》开始，以考证其为西夏活字印本“起家”的。我的根是在“西夏活字”，文中的精华也在“西夏活字”，这就是为这本小册子定名的由来。

这些文章，大都发表在品位较高、影响较大的学术刊物上，如《国家图书馆馆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文物》、《考古与文物》、《中国印刷》、《文献》、《寻根》等；有的还发表在台湾的《中华印刷科技年报》、《印刷与设计杂志》、《印刷科技》等刊物上。近几年

年来，常有朋友说我的文章有较高学术价值，但极其分散，连学科内人士也难知晓，希望能集辑出版。当然，这也是我的希望。这就是我出版这本文集的原由。这本文集对印刷史有关问题的探讨，如能有助于国人对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文化的认识，有助于对中国印刷术传播于世界的认识，从而更深切的理解我国古代人民对人类文明进步所作的伟大贡献，将是对我最大的慰藉。

应该说，我的写作态度是认真的、严谨的，力求做到实事求是，言必有据。这次汇集时，修正了一些错误，又有所删节、增补，有的标题也有改动，并尽可能多地配了些图片，希望做得更好一些。尽管如此，限于水平，难免有不成熟、不完善、甚至错误的地方。为此，在将这本小册子奉献给社会的同时，我也竭诚渴望得到回报——这就是读者毫无保留的批评与指正。

内容提要

本文是每篇文章的提要,以便了解写作的背景及其内容。

一、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本续》1991年秋出土于宁夏贺兰山,经笔者研究认为是西夏木活字印本。1993年冬,该文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在《中国印刷》1994年2期发表。《本续》是学术史上首次发现的早期木活字印本,备受学界关注。1996年11月,文化部接受中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俞伟超等学者的建议,组织专家在北京鉴定并得到确认,从而使个人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成果。本文记述是经的发现和研究情况,特别是对定其为木活字的依据,进行了探讨。文后附有:

- (一)文化部“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鉴定意见全文;
- (二)罗丰:访西夏考古专家牛达生教授谈“西夏木活字印刷”。

二、西夏文佛经《本续》是现存世界最早的木活字印本

1996年,在《本续》是西夏木活字印本成果鉴定会上,与会专家提出一些问题。尽管经过讨论,大家取得一致认识,但说明笔者对有些问题的研究尚欠深入,阐述得不够明白。为弥补上文的不足,又撰一文在台湾《中华印刷科技年报》(1997)发表。本文以台湾发表的文章为主,又综合其他相关文章合成。对《本续》的刊印年代、版本特点、学术价值等,作了更为全面、深入、系统的阐述。

三、西夏刻书印刷事业概述

在上世纪的近百年中,在西夏故地的西北地区,发现了大量西

夏文献,计有数千卷之多,还有版画、雕版等,大大丰富了中华古籍的宝库。本文通过已公布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对西夏的刻书印刷事业作了概述。西夏重儒兴佛,发展文化教育,大量刊印各种书籍,其中有国家法典、字书辞书、儒经道藏、历史文学等,而以佛经最多。西夏书籍,有西夏文的,还有汉文、藏文的;有官方刻的,还有私人、寺院刻的;有雕版印的,还有当时最为先进的活字印的。西夏仁宗时期,是西夏刻书印刷事业最为繁荣的时期;西夏的刻书印刷的中心在京都中兴府。西夏书籍的装帧形式富于变化,版面设计别具特色,反映了西夏的人文形态和文化面貌。

四、西夏活字印本的发现及其印刷技术研究

有人说,考古是发现的科学,我说,考古还是再发现的科学。在上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出土的文献中发现了西夏活字印本;在对上世纪初黑城出土的俄藏西夏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竟然也发现了西夏时期的活字印本。我们知道,至今未发现宋元汉文活字印本,这就使西夏活字印本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本文分别介绍了宁夏贺兰,甘肃武威、敦煌,及俄藏西夏文献中的 8 种活字印本,并概述了上述活字印本的版本特点,特别是泥活字和木活字在版本上的区别。还对西夏的活字印刷技术进行了探讨。

五、西夏文泥活字印本《维摩诘所说经》

1987 年发现于武威,经孙寿岭研究认为是西夏泥活字印本,并著文在 1994 年 3 月 27 日《中国文物报》发表,从而引起学界重视。1998 年 3 月,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鉴定,肯定其为活字印本,但对是否是泥活字,“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经孙先生提议,笔者对是经作了进一步研究。拙文认为,是经中“气眼笔画”“变形笔画”的形成,与泥字在制作、陶化过程中产生的气眼、流釉有关,再一次肯定其为泥活字,而不可能是其他活字。孙先生以坚强的毅力,在煮饭炉上烧出 3000 多个泥活字,并印出仿本。有人著文称他为“当代毕昇”,本文也对这种精神给以高度评价。